

◎ 王一心 著

# 陶行知 最后的圣人

在中国教育史上，陶行知先生创立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学说。在如今21世纪的时空背景上，他那前卫的教育理念，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團結出版社

最后的圣人  
陶行知

◎ 王一心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最后的圣人 : 陶行知 / 王一心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80214-896-3

I. 最…II. 王…III. 陶行知 ( 1891~1946 ) - 传记 IV. K 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09 ) 第 170326 号

---

出版 :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 100006

电话 : (010)65228880 65244790 ( 出版社 )

(010)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 发行部 )

(010)85113694 ( 邮购 )

网址 :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 65244790@163.com ( 出版社 ) 65228880@163.com ( 投稿 )

65133603@163.com ( 购书 )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装 :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公司

---

开本 : 170 毫米 × 250 毫米 1/16

印张 : 25.5

字数 : 480 千字

印数 : 6000

版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书号 : ISBN978-7-80214-896-3 / K · 539

定价 : 39.80 元

(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

## 序

陶行知的名气，逾出了他的专业圈。所以提起陶行知，连教育界以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有名的教育家。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教育家总是坐在书斋里，苦心研究教育理论与规律的；要么是待在学校里，婆口教导莘莘学子的。可是陶行知却与这些“标准”的教育家有很大不同，尽管他也孜孜矻矻从理论上研究教育，他也对学生们善诱循循、教导谆谆，但他所做的，远不止这些。或者说，他所做的特别有价值的，不在这些方面。

翻开中国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以降的与陶行知学历相仿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史，就会发现，他们所走的道路虽然因了国运的蹇剥、年代的动荡、外强的入侵而各有坎坷，但相较于陶行知所行之路，总还不失为常途。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所经历的坎坷，是一般人都会经历的。而陶行知除了“照常”经历这些坎坷外，还经历了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曾经历的挫折。

在抗战之前的二十年里，像陶行知那样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除了入仕的不算，单是安身于大学教席的，也多有物质生活优裕、社会地位甚高的黄金岁月。而陶行知，却出象牙塔而放弃了“阳关道”，另选了一条崎岖的山路，披荆斩棘，踽踽独行。因此，在这一群知识分子中，陶行知“另类”的标记很明显。自然的，他的人生价值也恰恰在于此。

从身份的内质来说，陶行知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更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只不过他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围绕教育，所以不妨称之为社会教育活动家。

陶行知是一位很有“异质”感的人，这使他不安于现状，不囿于传统，而常思改变，勇于革新，喜另辟蹊径。他身上的这种特质，在他步出校门，刚刚踏上社会的第一份工作中，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之所以成为社会活动家，其原因也即在此。

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教育活动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及其所走的大众教育、教育救国之路，必然是独特的；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相比，迥异是必然的。“独特”是陶行知及其思想生命力长盛的炭火。

在陶行知逝世六十年后的今天，他的影响力并未因他的渐行渐远而稍有减弱，反而更增强、更扩大了，“陶行知研究”成了一门显学。如今国内，不仅成立有全国性的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在大陆总共三十余个省份及直辖市中，除了五六个较为偏远的省份外，都成立有省一级的陶行知研究会，而市级的、县级的陶行知研究会、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及其他单位部门的陶行知研究会、研究所、研究中心加起来有数百近千之数，以陶

行知为专业研究方向以及研究过陶行知的人更是多不胜数。陶行知的作品选集不断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他的全集也分由两家出版社出版过三个版本；研究陶行知的各种专著以及描写陶行知的不同体裁的作品达数百种，且每年还在以数十本的速度递增；怀念或研究陶行知的文章，总数达数千篇，每年以数百条的速度增加，且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加速增加的趋势明显；全国又有许多以陶行知名字命名的各级学校，以陶行知名字命名的还有一些期刊；全国各地多处建有陶行知纪念馆；如果用卫星拍摄的地图搜索，或许可以看到中华大地上雨后春笋般的无数个立身室外的陶行知塑像，它们长年于日晒雨淋、风吹霜打中，表情不变地思索或关注着中国的教育；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兴起，陶行知网站也层出不穷。在当今中国，没有一位教育家乃至历史名人，能如此广泛地、热烈地受到人们的崇敬和关注。这种绝无仅有的景观，或可称之为“陶行知现象”。也仿佛表明，陶行知的一切都是独特的，无人能及的。

在抗战中及抗战胜利后，中共重要官员不止一人当众表示过要请陶行知做教育部部长的意愿，这令人不禁产生设想，假如陶行知不那么早逝，1949年后或许真做了共和国的教育部部长，那么他的思想，肯定会更多地影响甚而主导当代中国教育，那么我们的教育，很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陶行知一辈子都在努力把孩子从书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最反对学生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最不屑书呆子。而我们今天的教育，是要学生像青虫钻入菜叶一样，尽可能地没入到书本里去，头埋得越深越好。在国家、社会、家庭各方面的诱导与压力下，标准的书呆子在流水线上被成批地生产出来。

当今我们在子女教育方面早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现象，当年陶行知却看得非常严重。当他留学归来做了大学教授之后，看到随着自己收入的丰厚，家庭条件变得优越，他的儿子们都变成了少爷，吃饭有人添饭，穿衣有人洗熨，睡觉有人铺被，什么事都不用做。在老妈子和佣人的服侍下，小孩子的手和脚都变懒了，触动很大。他认为中国人的大病都与手脚有关，其中一种就是读书人的软手软脚病，导致呆头呆脑。他的逻辑是，“小时候不能动手动脚，大的时候当然一切事要别人做；小的时候做惯少爷，大的时候当然做老爷。”甚而“今日卖国贼，哪一个不是当年的双料少爷！”

可以想象今天对陶行知的这个观点不以为然或不以为意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因为溺爱子女唯恐不深、一有条件就要让子女做少爷小姐的父母比比皆是，而且认为理所应当；又有多少从事教育及其管理的人，头脑中闪过要改变这种状况的念头呢？

陶行知对此是真痛心疾首的，甚至于他的著名的晓庄师范学校，其创办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这个啊。

作者

2009年5月4日于随园

# 目 录

第一章 驾鹤西去 .....	1
一、身后不寂寞 / 1	
二、哀荣 / 18	
三、病逝 / 28	
第二章 大后方办学与再婚 .....	46
一、与政府和而不同 / 46	
二、苦办难童学校 / 53	
三、第二春 / 82	
第三章 出国抗日 .....	104
一、做了国民外交使节 / 104	
二、成立全欧抗联 / 109	
三、新华侨的“接生婆” / 113	
四、第八君子 / 119	
五、争取洋人同情与支持 / 125	
六、信心的力量 / 132	
第四章 公而忘家 .....	146
一、理还乱的西南之行 / 146	
二、病笃爱弛的发妻 / 161	
三、亦慈亦严为人父 / 167	
第五章 愈挫愈奋 .....	173
一、“通缉犯”做了《申报》顾问 / 173	
二、让“赛公主”下嫁平民 / 176	
三、冷对政府无常 / 181	
四、一个快速普及教育的梦想 / 191	
第六章 流亡生活 .....	216
一、匿居租界 / 216	

二、与胡适越来越远 / 231	
三、岛国疗伤 / 235	
第七章 为了一所新奇的学校 .....	239
一、创办晓庄师范 / 240	
二、大祸降临 / 267	
第八章 走出象牙塔 .....	295
一、从南高师到东大 / 295	
二、想给上亿人扫盲 / 318	
第九章 留学美国 .....	339
一、赴美之途不轻松 / 339	
二、在伊利诺一年半拿硕士 / 343	
三、升入哥伦比亚大学 / 353	
四、与胡适同学并不亲热 / 364	
第十章 徽宁求学及确立信仰 .....	371
一、故乡启蒙 / 371	
二、金陵读中学和大学 / 375	
三、做了基督徒 / 380	
第十一章 从哪里来 .....	387
一、先祖 / 387	
二、父亲 / 390	
三、母亲 / 395	
主要参考文献 .....	400
后记 .....	401

## 第一章 驾鹤西去

1946年7月25日，五十六岁的陶行知逝世了。

他的死，就像森林里，一棵参天大树忽然连根拔起，訇然倒下。一时间，大地颤抖，山谷震荡，风声呼啸，峡水急漩！

有的人，死如灯灭。一死，一切都消失了，消失如入夜幕。

有的人，死如风停。一死，一切都定格了，树也终于静了。

有的人，入土为安。一旦入土，死者真的已矣，生者也真的安了。

可是陶行知，一生轰轰烈烈的陶行知，死后灯不灭，死后风不停，泥土隔不断阴阳，毁誉轮流至，虽然“身后是非谁管得”，总之是不寂寞了。

### 一、身后不寂寞

陶行知因为死得太出乎人们的预料——以他那样的年龄、那样的体魄、那样的精力，谁会想到他会一朝倒下呢！而且倒在除了政府的各方——学生、民主同仁、中共人士——都正亟需要他的时候，于是有了极度的惊讶、极度的痛惜、极度的遗憾，结果一发而为无尽的追悼和怀念，一时间，占据了报刊大量篇幅，充满了人们的视听。

当国民党被赶到小岛上后，人们以为陶行知的时代到来了，以为从此可以高举他的旗帜，尽情地、自由地研究、宣传他的教育思想，沿着他筚路蓝缕开辟的大众教育、教育救国之路甩开大步前进了。可是形势陡转，陶行知遭到了全国范围的大批判，继而被打入冷宫。三十年后，陶行知冰消雪融，急速回暖，曾经剥夺了的、禁止了的一切，重又还之于陶行知。陶行知就像一个出远门的家人，在沧海桑田之后，回来了。



## 1. 武训再世

武训是清朝晚期的一个著名的乞丐。民国的冯玉祥将军是陶行知的“黑颜”知己，却对陶行知的年龄搞不清楚——在陶行知死之前三个多月，那时陶行知已经五十五岁了，冯将军还以为只有五十。他与陶行知一样，也喜欢写普通士兵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打油诗，他又喜欢书法，于是用毛笔写了一幅字去贺寿，是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古今两大叫化子，乞讨兴学救赤子。”将陶行知与武训并列，调侃的话中有实情。

陶行知对武训情有独钟，也可以说，他是武训的化身。陶行知的一生，从青年到晚年，在超过二十年的时间里，在不同场合，不知有多少次，作报告，或演讲，或与人交谈，不时提到武训；在他笔下，于不同体裁，诗歌，散文，教材，连私人的书信里，也都屡屡涉及甚或专论武训。而也有人在陶行知的生前身后，称他为“活武训”、“当代武训”的，而他也自称要做“新武训”。陶行知对武训，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兴趣呢？他又为什么会成为武训的“化身”呢？

武训与陶行知虽然都生在清朝，但不同期。武训比陶行知早出生五十多年。陶行知出生方五年，武训就去世了，仿佛武训是见有后来人，才放心撒手西归似的。

武训是山东堂邑县（今冠县）柳林镇西武庄的一个贫苦农民，他七岁丧父，跟着母亲与兄长过活，家里虽然有几亩薄田，但维持生计仍很困难，遇到青黄不接或歉收，竟要随母亲行乞度日，年纪稍长即到远房亲戚家做佣工。武训家贫上不起学，可他很想读书，每当见有儿童到乡塾去，就会情不自禁地在后面跟随。上学的小孩都觉得很讨厌，于是群起而辱之。武训自尊心又很强，这时便非常悲愤。加上后来又受了农村秀才地主的凌辱，终于激发出行乞办学的人生大志向，先后开办了三所义学。他办学的方式很特别，办学的经费来自乞讨不用说了，奇怪的是他乞讨的方式，比如磕个头几文钱，翻个跟头几文钱，被揣一脚几文钱，等等，如同书画家开例的笔润。总之施主只要肯掏钱，叫他做什么都可以，而动作难度越高，越低贱，越遭人耻笑，收费越高。对付义学里的老师学生的办法也很特别，老师不好好教，他就跪着不起来；学生不好好学，他也跪着不起来，直到对方答应改过为止。为了心底的一个大目标，性格中本来最强烈也最脆弱的自尊心竟消融了。

陶行知最初对武训发生兴趣，来自武训的“无钱也可以办学”、“再穷也要办学”的“异行”。1917年夏天，陶行知怀着“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的宏愿，从美国留学归来，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其后几年间，他醉心教育改革，在报刊上撰文大加宣传“新教育”，同时思索切实可行的中国教育新路径。可是中国是一个穷国，失教者众多。面对教育经费短缺这只拦路虎，许多人觉得有心无力，无可奈何，也有

人坦然于“无钱办不了事”的常理。对此深有感触的陶行知，却蓦然从武训那里，发现了开启锈锁的钥匙，这也是他与武训神交的开始。

在1922年7月上旬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上，三十二岁的主任干事陶行知，在他所作的社务报告中，提出应效法武训，他指着会场上悬挂着的武训画像告诉众人“这像是社员郑锦先生画的”，接着说：“世人以为无钱可以不办学，但武训不是这样想。他说就是穷到讨饭也要办教育。他是已经照这话实行的。”他此后，便也是“照这话实行的”。甚至可以说，陶行知的一生，就是穷办教育的一生。



迥异于一般教育家的社会教育活动家陶行知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期开始，陶行知就全力投身到平民教育中去，而且将武训树为榜样。1924年2月，湖南《大公报》上刊登了陶行知写给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务主任周方谈平民教育方针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办平民教育要不要经费？要。钱少的人能不能办平民教育？能、能、能。山东乞丐武训，开三个学堂……”

与其说陶行知从武训身上找到了穷办教育的办法，不如说是看到了穷办教育的精神。1923年，他与朱经农合编《平民千字课》的课本，将武训痴心办学的事迹编成一篇浅易明白的三百来字的课文。课文的结尾是这样的一段话：“武训虽然死了，他的精神可是要活到千万年的。如果我们个个都有武训的精神，还怕国家不进步吗？”

在抗日战争异常艰难的岁月里，武训精神一度成为陶行知的精神支柱。早在抗战中期，陶行知的重庆育才学校经济上就发生了危机。1941年4月中旬，陶行知在写给育才学校副校长马侣贤的信中，表示自己要以“武训的真精神”设法渡过眼前的经济难关。

1942年4月，陶行知对人说：“山东的武训先生是一个乞丐，都能办三个义学，我陶行知是个留学生，难道连一个育才学校都不能继续办下去吗？为了米，学习武训，各处磕头吧！不能让小孩子感到失望的！”

武训事迹之于陶行知，犹如一剂青春神药。陶行知的精神状态正如他写给卢作孚的信中所言：“经济益感困难，精神反觉兴奋。”这兴奋是发自于心而非做作于人前，是真实的而非虚假的，这也可从他写给妻子的信中看得出来：“这次有些远方来的客人问我已上四十岁没有，我叫他们猜，也有猜三十的，安徽中学同学会中也有人说我比从前年青了。也许他们是当面灌米汤，但近来身体似觉好些。总之，你的姊姊所将看

见的是一位出她意料之外的年青的妹夫！哈哈哈哈哈！”

1944年年底，抗战已进入第七个年头，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辰光，大后方的重庆物资极度匮乏，物价飞涨，米珠薪桂，一般人为自己糊口都非易事，而陶行知却要独力支撑育才学校，自然异常吃力。此时的育才，就如同挣扎于急水滩头上的一条船，随时可能侧翻沉没，而陶行知就像一个纤夫，弓身向前，脚步铁沉，纤绳深深地勒进肩胛——如此撑持，不仅有赖于体力，而且也有赖于毅力。正是在精神上的这种需求下，陶行知再次请出武训来自勉勉人。秋冬季节的一天，历史学家翦伯赞去探望陶行知，陶行知对他说：

“我在中国史上发现了一个伟人，你猜猜是谁？”

翦伯赞对陶行知还比较了解，所以说：“你所认定的伟人，当然不是秦皇、汉武，更不会是汉奸曾国藩呢！也许是哪一位无名的民族英雄吧？”

陶行知：“你猜错了，他不是英雄，是一个乞丐。”说着，一边将手里拿着的一本《武训画传》给翦看，一边又说：“如果我不发现武训，育才学校恐怕要关门。现在，有了武训领导我，育才不会关门了。”

1943年武训生日前一天，陶行知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采访，说：“武训先生的生日，就是我们苦孩子的生日。他最伟大的精神，是跳出自己的范围而以别人的利益为中心。没有钱不识字而能办学校，且有坚持到底的精神。”随后又喊出了这样的口号：“武训精神普及全世界，照耀万万年！”

之后陶行知对武训精神，更有了理性的认识、清楚的归纳。1936年，段绳武与孙之隽合作过一本《武训先生画传》，1938年段在长沙单独出版。段去世后，其夫人王赓尧将该书铅版交由生活教育社再版。1944年5月，该书面世，是线装版，书颇受欢迎，8月份即印了第三版，次年更印到了第六版，当年陶行知又将其中文部分译成英文出版。

书再版时陶行知亲自作跋。他在那篇一千二百字的跋里，除了记叙武训以及深受武训影响的段绳武的事迹外，还将武训的精神，总结为“三无四有”，即：无钱无靠山无学校教育；有合于大众需要的宏愿，有合于自己能力的办法，有公私分明的廉洁，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

在这“三无四有”中，只有一个“无学校教育”——武训未受过学校教育——与满腹墨水的陶行知不同，其他几条，则无不相合。当然并不奇怪，因为陶行知不仅是照着武训的“话”实行，也是照着武训的“行”去做的。

“三无”不必说了，“四有”之一，陶行知与武训存在差别，武训是无意识“撞上”，陶行知则有此自觉。“四有”之二，武训的办法怪诞也好，作贱自己也好，总之的确

是他力所能及而行之有效的；陶行知一生在为推动多项大众教育的运动中，灵感泉涌，有数不清的发明创造。“四有”之三，陶行知为办学募捐，多是个人行为，少人监督，廉洁与否，全赖自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将衣服上的两只口袋，分为一只装公款，一只放私钱，以免相混。“四有”之四，可以说陶行知最后是倒在了办学的路上的。

陶行知对武训的理解，与日俱增，随着他在大众教育路上行远感多而愈深，1944年9月上旬，陶行知作诗《武训赞》，称颂武训“大仁大智，大彻大悟”。这八个字，绝非泛泛之语。

越是理解，尊敬自然越深。但陶行知并不因此就恨不得将武训供到庙里去，反而在人们狂热起来，要把武训当做汽球似的放到天上去的时候，却是他，要把武训请下神坛，还他布衣本来面目。在武训诞辰一百零七周年之际，他看到一位友人写的题为《武训——现代的圣人》的纪念文章，“大吃一惊”，于是苦劝朋友把题目换掉，把武训从“圣人圈里救出来”，他认为武训不是圣人，虽然伟大，仍只是一位老百姓。

陶行知对武训，不只不愿把他视为圣人，甚至也不愿把他视为“异人”。武训本有“千古奇丐”之冠，山东的民众也有直呼其为“武圣人”的。陶行知原也曾称过武训为奇人，那是1934年值武训九十七岁寿辰，山东临清武训小学沙明远、张自忠、韩复榘等十八名校董发起纪念武训九十七岁诞辰的活动，在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全国各界的热烈响应，形成了全国性的武训纪念活动的高潮。在该校编印的《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上，政界军界学界名人纷纷题词，陶行知题的是一首诗，名为《兴学的乞丐》，也把武训称做古往今来“最难得”的“奇男子”。而十年后，陶行知的想法改变了，他对为武训立传的张默生将武训归入《异行传》不以为然，说：“武训不是异人，不是异行人。他是一个平常的人，他是一个平常的老百姓。他一生只做了一件平常的事：兴学，兴学，兴学。”

陶行知之所以不愿人们把武训看作圣人、异人，是因为他一直在号召众人学做武训，呼唤千万个武训的出世。早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陶行知在上海开展工学团运动，进行普及教育，鼓励即学即教，包括以先学的小孩为师。1934年4月上旬，他在山海工学团庆祝儿童节大会上演讲，内容即以武训一心办义学的事迹激励众人，号召“每一个农友都做一个武训，每一个小朋友都做一个武训。”

1940年6月1日陶行知在《新武训》一文中写道：“中国不能等待数十年出一位武训。”次年4月6日他在重庆育才学校朝会上向全体师生宣布并号召：“我决心要跟武训学，我们要做一个集体的新武训。”1945年12月5日，为纪念武训诞辰一百零七周年，生活教育社在重庆七星岗江苏同乡会举行两场纪念会，上午是儿童专场，下午是成人专场。陶行知在上场的演讲中，鼓励小学生要做小武训，做小先生，并大声问一句：

愿意不愿意？换来了在场的小朋友一齐举起小手来，齐声道：“愿意！”

陶行知认为：武训“所想的，老百姓都想得到。他所说的，老百姓都说得出。他所干的，老百姓都干得了。只要肯学习武训先生的尽其在我，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成为武训先生”，如果那样的话，不但普及教育可以成功，甚至于“在二三十年内创造一个独立自由平等幸福进步的新中国也并不太难”了。而一旦将武训变为圣人与异人，大众对他则只有仰颈或侧目，学做自然就不敢了。

陶行知对宣传武训不遗余力。1943年11月下旬，陶行知眼见还有十天就是武训一百零五周年诞辰日，便给育才之友及生活教育社的同志们写了一封信，提示这一纪念日，告诉他们育才学校将为此举行纪念活动：音乐组在重庆广播大厦开办三场音乐会，节目有学生为武训的诗谱曲的大合唱；绘画组将武训生平事迹刻成版画，在重庆儿童美术馆公开展出。除此之外，还约请各报登载关于武训兴学的诗文，生活教育社的《战时教育》还将出武训专号。甚至还打算向政府建议：以武训的生日——12月5日为兴学节，以12月1日至7日为兴学周，整个12月为兴学月。

在致力于宣传武训、效法武训的活动中，陶行知对武训产生了深厚的感情。1942年武训的生日，陶行知在育才举行了一个纪念会，纪念这位诞生于一百年前的他心目中的祖师。会上，陶行知介绍了武训的生平，朗诵了武训的许多诗。显然陶行知直到次日还沉浸在祭拜武训的激动中，这可从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大谈武训看得出来：武训“为兴学而生，为兴学而死。一切为兴学，兴学为苦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之生是苦孩的幸福，他之死是苦孩的损失。”显然是在以武训自况。

世人都以为武训是一个苦行僧，独有陶行知看出武训是乐在其中的，他说武训“不是一个苦行者，他是抱着一件大事，高高兴兴地干，把一些私人的小小的痛苦都忘掉了。看他一面讨饭，一面做工，一面唱歌，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三十年如一日，只是为着要完成他心目中的一件兴学的大事。他何曾是一个苦行者。”这当然也是陶行知在说他自己。就在他苦撑育才学校的时候，有好心的朋友曾劝他放弃育才，说你何必“顶着石臼做戏、抱着石头游泳呢？”他在几天后的育才学校朝会上就此道：“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可见陶行知与武训的确是知音，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比一般人更理解武训。

1944年秋，沈钧儒的长子沈叔羊画武训像，请陶行知为其题词，陶行知便写了一首诗：“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一世，到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你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博士盖过。当你跪下，谁奈你何。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着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这既是陶行知心目中的武训形象，也是陶行知的自画像，除了其中“朋友无多”、“未受教育”、“不娶老婆”几项外，其他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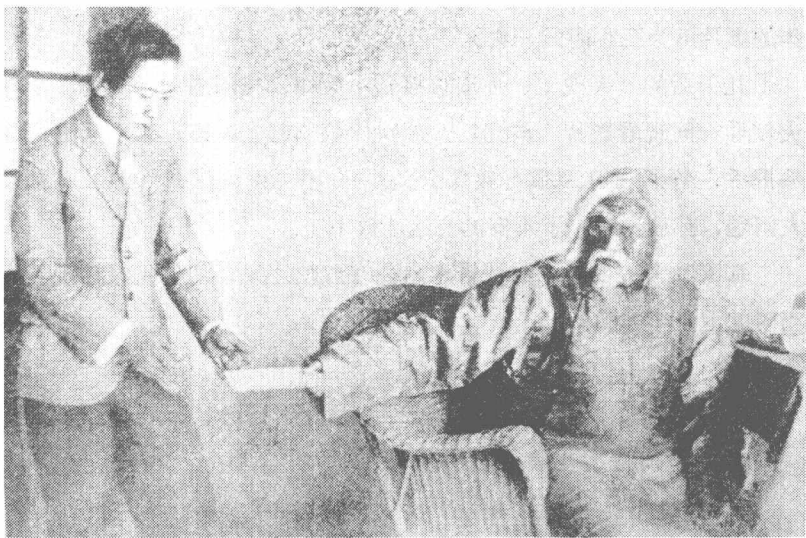
与陶行知相合，尤其是“人生为一大事来”更是他的信条和名言。一年后，陶行知将这首诗稍加修改，以《武训颂》为名请人谱成曲。

陶行知爱写诗，他的诗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故而有“大众诗人”、“平民诗人”之誉。武训有诗三十二首，多是打油，诸如“吃的好 / 不算好 / 修个义学才算好”、“喝脏水 / 不算脏 / 不修义学真肮脏”等，与陶行知诗风很接近。所以陶行知很喜欢武训的诗，以至还能背几首。他很喜欢在演讲中当众朗诵。1934年4月4日在山海工学团庆祝儿童节大会上演讲时就背诵了六首，1942年12月他写信告诉夫人在武训生日纪念会上他“朗诵了他的许多诗”，称赞武训是“一个真正的平民的诗人、平民歌者”。他在信里不厌其烦地抄录了武训的十五首诗之后道：“你看了这些诗就知道，非武训自己是唱不出来。这些诗是他的人生观，也是他的自传。诗在他的手里，不是个玩意儿，而是宣传兴学的武器。他为做工而唱，为宣传而唱，为兴学而唱，为生活而唱。所以在他的诗里没有清风明月，只有做工、讨饭、修义学……”陶行知的诗里也少有清风明月，多为“一件大事”，多的是为大众教育的内容。

总因陶行知如此敬奉武训、推崇武训、激赏武训，并以武训自勉、自励、自许，以致有人竟说：“纪念武训是陶派的把戏。”虽然这话含意不善，却也从某个侧面道出了陶行知与武训的“亲密关系”。这话当然也使陶行知警醒，所以他在《解放武训》的演讲中，告诫同人不要把武训圈在“我们”的小圈子里。

陶行知对于戏剧向来非常注意，早在1918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就曾注意到戏剧的教育功能，思考过戏剧与教育的关系。认为戏剧无论对于演员，还是对于观众，都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1929年1月，田汉率领的南国剧社应邀到陶行知的晓庄师范

陶行知非常重视戏剧的教育性，不仅亲任晓庄剧社社长，还亲自登台，这是他在《生之意志》一剧中扮演白发老父的角色。



演出。在南国剧社指导下，晓庄师范成立了晓庄剧社，陶行知亲任社长，并曾创作剧本及登台演出。抗战中在重庆，陶行知去观看中央青年剧社排演的莫扎特的《安魂曲》，竟致泪如雨下，而要育才学校的师生哪怕从嘴里省下饭金也要观看演出；继而读萧伯纳的剧本《康蒂姐》，也感动不已；他的育才学校的戏剧组，经常外出演出，广获社会好评。抗战后期，四川一度受到日寇的威胁，社会动荡起来，陶行知于是开始倡导土话剧运动，他说：“土话剧也是保卫四川的力量！”在陶行知的要求下，师生们学习四川话，编了不少方言剧本，比如《啷咯办》、《不太平》等，他们用四川话表演的话剧，是学校附近一带农民百看不厌的好戏。日寇退出柳桂后，师生们即以方言剧配合农村普教工作，效果也相当好。

所以对于宣传武训，他想到戏剧就不奇怪了。抗战期间，他曾约请田汉夫妇分写关于武训的话剧和歌剧，而请孙瑜考虑拍电影。

## 2. 电影《武训传》惹祸端

1944年夏季的一天，陶行知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厂长李清惊的陪同下来见该厂编导孙瑜，把一本生活教育社刚出版的《武训先生画传》送给他，希望他有机会能将武训的事迹拍成电影。那时孙瑜正为没有剧本发愁，于是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画传，深为感动，随即草拟了一个剧情梗概。此后数年，影片《武训传》几经波折，从解放前拍到解放后，终于1950年年底摄制完毕。影片首先在上海和南京公映，引起轰动，一时好评如潮。该片被《大众电影》评为1950年十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1951年2月，孙瑜携该片拷贝进京，在北影与几位剪辑人员熬了一个通宵，将原本上下两集影片剪为三小时的一集。

几天后的一天晚上，孙瑜被接到中南海，与周恩来、朱德、胡乔木等一百多位中央领导一同观看影片。放完后，放映厅里响起了掌声，朱德从很远的坐间走过来与孙瑜握手，赞了一句：“很有教育意义。”除了一两处细节问题，周恩来对影片没有提出大问题，孙瑜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这才放下了。

那天晚上，毛泽东与江青未出现在放映厅里，他们是过后观看了影片的。毛泽东当时的卫士李家骥回忆道：

2月末3月初的一天晚上，主席吃饭时，江青对主席说：“有个电影叫《武训传》主席看过吗？”

“这个片子怎么样？”



江青把影片情况作了一个简单介绍：这是昆仑影业公司制片，孙瑜编剧兼导演、赵丹主演，公映后各地报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主席可以看看。”

“我也听到一些反映和评论。”主席说。<sup>[1]</sup>

3月3日是个星期六，毛泽东与江青、孩子以及警卫班的卫士们在中南海含和堂一同观看了《武训传》。江青后来不止一次向人描述当时的情形：毛泽东在观片过程中，一言不发，只是一根接一根的吸烟。影片放完后，他叫人“再放一遍”，这使江青和周围的工作人员好生奇怪，因为毛泽东还不曾有过一部电影连看两遍的。第二遍放完后，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这个电影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sup>[2]</sup>

4月20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在政务院第八十一次政务会议上汇报“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中，明确说《武训传》是一部“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传统作了不正确表现的，在思想上错误的影片。”五天后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一期上，发表了一组文章：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江华的《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和鲁迅的旧文《难答的问题》。报纸在编者按里指出：对影片《武训传》及武训其人持赞赏态度的人“缺乏坚强阶级观点与正确的历史观点”，在对中国革命传统的认识上，有“很多糊涂观念”。一场政治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当年曾那么极力推崇武训、与“武训”有那么密切的联系，甚至自己也宣称要做武训，还宣称要培养出千千万万个武训的陶行知，要说在运动的暴风骤雨下，还想安卧于九泉是奢望的话，那么，在运动初始，沙尚未飞、石还未走的时候，陶行知已被牵连，就显得有点不同寻常了。

最先提到陶行知的，是那篇《不足为训的武训》。而作者的用意并不是批判陶行知，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为陶行知“开脱”，试图将陶行知与武训区分开来，所以他说武训不足为训，而陶行知处于当时的时代局面——“国民党万恶统治下的白色恐怖环境与条件，对于人民教育家的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是百般的破坏与阻挠”——于是，陶行知在那样的情况下“提出武训精神来，有着积极的作用。陶行知先生当时是对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足为训的武训》不肯批判陶行知，于是它就遭到批判了。半月后，《文艺报》四卷二期上，刊登了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一位副部长以笔名杨耳发表的《试论陶行知先

[1] 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执笔：《领袖身边十三年：毛泽东卫士李家骥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504页。

[2] 参见袁晔：《〈武训传〉批判纪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88-89页。



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一文。杨耳系受命操笔，仓促上阵，准备不足，语气所以不够铁硬。他在文中坦言道：“陶先生为什么表扬‘武训精神’，又如何表扬这一精神，笔者没有做过研究。”他只是从贾霁文章引文中的“一些根据看来，陶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未必是恰当的。”他认为陶行知的“表扬”，模糊了人民反封建压迫的认识，“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所以“认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是不对的，至少是完全可怀疑的。不管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

仅仅过了六天，5月16日，杨耳的文章就被《人民日报》转载了，题目改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只稍稍动了几个字，而战斗性陡然增强了。文章的内容也同样做了一些删改。《人民日报》还加了编者按，批判的旗帜更加鲜明了：直接将武训定性为“封建统治拥护者”，而给影片《武训传》一下子戴了三顶大帽子：一、污蔑农民革命斗争；二、污蔑中国历史；三、污蔑中国民族。

5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亲笔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以社论的名义发表。被称为陶行知的“优秀学生 and 亲密战友”的方与严当时撰文谈感想时道：“我读了之后，好像受了当头棒喝”。社论虽然自始至终未提及陶行知的名字，但显然由于它对杨耳的文章的态度，直接导致将批判陶行知“引向深入”。

在《人民日报》上，5月29日，丁曼公《武训的真面目》里说陶行知“看不清武训这个封建主义的奴才面目，把他当成改良主义的老师，这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政治资本贫乏的状况。”6月2日，李一氓《清除武训一类的错误教育思想》说得更明确：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感染有武训思想”，“是应该受到检查的若干种旧教育思想之一，不应该因为他本人尽力于反国民党的革命斗争而就迁就他的教育思想，无原则地加以原谅或赞成。”

在《人民教育》上，6月1日的第三卷第二期上社论的题目很醒目，是口号式的，叫《开展〈武训传〉讨论，打倒“武训精神”》。“武训精神”是陶行知提出与提倡的，喊打倒“武训精神”，自然与要打倒陶行知相去不远了。《人民教育》紧接着在第三期上，搞了个“关于武训问题的笔谈”，集中了包括教育界不少重要人物的二十三篇文章，集中火力开展批判。

其中一篇《这是一个起点》中，有这样一段：“我们要将我们的理论工作扩大到系统地批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各派的教育思想，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以及研究与批评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等。”不仅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要批评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资本主义教育思想并列，而且前两条陶行知是也都逃不了干系的：早在解放前就有激进人士批评陶行知是改良主义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对现代